

浙江大学因公出国（境） 团组出访报告公示

基 本 信 息	团组名称	浙江大学傅翼 1 人出访		
	出访期限	2019-09-01 至 2019-09-08	在外时间	总天数 8 天
	出访国家 (地区) (含过境)	日本,京都		
出 访 报 告	<p>一、 访问情况：</p> <p>应国际博物馆协会日本京都 2019 组委会的邀请，浙江大学傅翼于 2019 年 09 月 01 日至 2019 年 09 月 08 日赴京都参加学术会议。</p> <p>二、 访问成果</p> <p>2019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8 日，我有幸受中国博物馆协会（简称：中国博协，下同）资助，参加了国际博物馆协会在京都召开的代表大会（简称：京都大会，下同）。会议期间，除了出席全体大会之外，我主要参与的是博物馆教育与文化活动委员会（CECA）和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ICOFOM）两个专委会的活动。另外，我尽可能地参观了京都部分博物馆为这次大会策划的临时展览。这是我第一次如此密集地和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博物馆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接触、交流，可谓满载而归。在此，我主要就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和西方博物馆学研究的异同这个方面谈谈我的收获和思考。一方面，它们让我发现国际博物馆学学界和博物馆专家有相当多的人反对 2019 年 6 月国际博协提出的拟表决的博物馆定义提案，而且反对的主要理由和中国博物馆人的普遍看法接近：该提案过于繁杂，有过于脱离博物馆实践的嫌疑，以致于其无法有</p>			

效指导博物馆的实践。这一关键问题上的共识让我非常欣慰——中西博物馆领域之间并没有存在多么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另一方面，我依然发现中西方在博物馆学领域确实隔阂明显——这直接表现在博物馆哲学、理论传统、博物馆学研究思路上。西方博物馆学往往在博物馆与外部关系的语境下“自外向内”地思考、研究博物馆，而中国博物馆学往往更侧重于采用“内向性”视角——以博物馆自身为出发点思考问题。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博物馆哲学和研究思路上的差异是件坏事。我认为它给我的启示是如何在传承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哲学和博物馆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有效建立和西方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实践（因为前者肯定影响后者）的沟通路径，如果我们希望在国际博物馆领域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的话。

三、工作建议

联系我个人的工作，我尝试提出几个可操作的对策：

- 1、 鼓励我身边年轻的大学生和同行尽早加入国际博协专委会，并积极参加它们的活动，增进对国际博物馆领域的了解，并且更重要的是和他们分享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和实践的成果，从而引导他们去思考中国博物馆的问题。新任的ICOFOM主席非常年轻，但是在这个专委会活跃的时间非常长。我希望更多有志于文博事业的年轻人能学习这样的经验，我也愿意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 2、 我个人参与更多国际博协的活动，包括和亚洲国家的博物馆组织和博物馆人的联系，尤其是日本。日本在博物馆领域有非常优秀的经验，但是我以前对它的关注非常少。

备注：1. 团组（或本人）执行本次因公出访任务情况良好，主要任务、日程安排、团组成员等与任务申报时一致，如不一致，需详细说明；2. 须于回国（境）后一个月内在本单位内部完成出访报告公示。